

试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

王相钦

郑观应，又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广东省香山县人。生于一八四二年，卒于一九二二年，享年八十岁。一八五八年，年仅十六岁的郑观应，就放弃了中国旧知识分子读书、应举、做官的传统道路，远离故乡到十里洋场上海经商。经亲友介绍，先后充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的高级买办，并积极参与洋务活动，投资和创办近代工商企业。他相继担任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邦办、总办等重要职务，由一个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洋行买办，转变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家。

郑观应在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过程中，“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深感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危害。在与中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涉及有关“安内攘外之道，有触于怀，随笔札记。”^①撰写了许多有关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先后出版了《救时摘要》、《易言》、《盛世危言》等重要著作，宣传和提倡他要求实行改革、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救国主张和观点，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

郑观应思想体系的内容十分丰富，它的核心是“富强救国”，而要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就要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所谓“商战”，就是要振兴中国自己的经济事业，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从而，使中国“登于富强之境”，以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②这是郑观应对自己几十年经历的记述，他的一生也的确是在“商战”中度过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中国的社会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面对严重的社会现实，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商战上》中一开始，就慷慨激昂地指出：“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战。”^③如何与外国侵略者“决一战”呢？是用“兵战”，还是用“商战”呢？郑观应分析了当时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形势，认为经济侵略比军事侵略更具有危险性，提出了“商战”应重于“兵战”，以“兵战”治标，以“商战”治本的主张：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④

“练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⑤

因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注重于经济侵略，往往以军事侵略为手段，来达到经济侵略的目的。“各国兼并，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彼不患我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其力于商务者，所在必争。”^⑥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①而且，外国经济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也要比军事侵略大。“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况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②所以，要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必须把基点放在“商战”上，在经济上战胜外国侵略者。

历史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以进出口贸易而言，据海关统计，从1864年到189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94864943关两增加到290207433关两，三十年间增加了二倍多。而进口商品价值从46210431关两增加到162102911关两，增加了近三倍。外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鸦片，每年约三千三百万两；棉纱、棉布，每年约五千三百万两；各种洋杂货，每年约三千五百万两。由于进口商品的大量增加，中国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到九十年代，每年达到三千万两以上。“总计彼我出入，合中国之所得尚未能敌其鸦片、洋布二宗，其他百孔千疮，数千余万金之耗胥归无着，何怪乎中国之日急哉。”^③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和贸易逆差的增加，不仅加重了中国财政经济的困难，而且还打乱了中国原有社会经济的秩序，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时的情况，正如郑观应自己所描述的，“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背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如棉花一项，产自沿海，各区用以织布、纺纱，供本地服用外，运往西北各省者络绎不绝。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而南省纱布之利半为所夺。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呜呼！洋货销流日广，土产运售日艰，有心人能不愀然忧哉？”^④这样，在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中国之膏血既罄，遂成羸痿痼病之夫，纵有坚甲利兵，畴能驱赤身枵腹之人，而使之当前锋冒白刃哉？”^⑤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救国”，就必须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要进行“商战”，就要振兴中国自己的工商业。

首先，要批判中国传统的轻商观念，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郑观应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⑥“善于谋国者无不留心各国商务，使士、农、工、商投入所好，益我利源，惟中国不重商务，而士、农、工、商又各自为谋，虽屡为外人所欺，尚不知富强之术。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惠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船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⑦在批判轻商观念的同时，郑观应极力强调商业的重要性，“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⑧

郑观应强调商品流通在振兴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重视其他各业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富出于商，商出于士、农、工三者之力。”^⑨“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彼利。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⑩而且还明确指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⑪并提出了振兴工商业的十条具体意见，除“弛令广种烟土，免征厘税，徐分毒饵之焰”一

条不可取以外,其余各条皆为发挥本国经济优势,与外国侵略者进行“商战”的有效办法。

郑观应还特别强调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商战”中的重要地位。他强调:“国家欲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欲本国有通格致、精制造之人,必先设立机器、技艺、格致书院以育人才。”并指出:“我国与泰西各国通商在日本之先,而商务、制造瞠乎其后者,皆因无机器、格致院讲求制造之学,无商务通例恤商惠工,是以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遂致土货出口不敌洋货之多,漏卮愈甚。”“为当今致富之急务,非此不足补救万一也。”^①

这样,通过振兴工商业,中国就可以达到“富强救国”的目的,“国既富矣,兵能不强?窃恐既富且强,我纵欲邀彼一战,而彼族且恰色下气,讲信修睦,绝不敢轻发难端矣。此之谓决胜于商战”。^②

郑观应虽然强调“商战”治本,但并不忽视“兵战”治标。他指出:“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争于富强之世也耶?”“亟宜一变旧法,取法于人,以收富强之实效。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将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知己知彼,战守无虞。自然富国兵强,何虑慢藏海盗?岂非深得古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可以保富,之明效也欤!”^③

由此看来,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实际就是一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改革纲领,不但比他的前辈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先进,而且也比同时期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思想进步得多。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要含义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来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并不包括系统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科学技术,更谈不上学习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洋务派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要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起义斗争,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来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以达到“自强救国”、抵制外国侵略的目的。他在一九〇九年《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提出的“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④表达了他要求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封建制度日趋瓦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也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虽然,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范畴,在当时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因此得到发展,但是郑观应在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同时,在从事实际工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提出通过“商战”实现“自强救国”的主张的确是十分可贵的。郑观应不愧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先进思想家的代表,在中国近代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

(下转63页)

但孔丘创私人办学的先例，是历史上一件伟大的事业。汉司马迁所撰《史记·孔子世家》中对这一件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又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我们在二千年以后来探索孔丘和孟轲的教学思想，由于时代不同了，当然只能批判地探索。毛主席说得好：“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见《新民主主义论》）孔孟的教学思想和儒家学派的学风是历史遗留下的思想意识，具有“道古以害今，虚言以乱实”的反动性质。现今我们在振兴中华，同心同德，建设四个现代化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并举的时代，这种思想意识，在教育文化领域中，还存在残留的影响，既可有些“古为今用”之处，又可有些成为教学改革的障碍。我们试行探索，是批判它的不能作为“轨范效法”之处和“倨傲自大”不肯下人的恶劣学风，从而发扬我们培养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及促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恩格斯说：“权威是指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见《论权威》一文，《马恩选集》第2卷第551页）教学上一切集体活动都要通过组织起来，而一定的权威和服从，不管在怎样的组织中都是必要的。组织纪律性的自觉是搞好教学的必要保证。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让我们教师和学生共同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搞好我们的教学。

作者附言：本文所注引言，绝大部分引用的是原文。只有少数不是引的原文而是作者的译文，这主要是为了精简文字。至于引言的出处则完全是同一出处。

（接第43页）

注解：

- ①《盛世危言》，自序。
- ②②①《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 ③④⑦⑨⑪⑬⑮⑯《盛世危言》，商战上。
- ⑤⑧⑫⑭⑰⑲商战下。
- ⑥⑬商务三。
- ⑩纺织。
- ⑭商务二。
- ⑱商务五。
- ②②《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1064页。